

清代瓷器研究成果举要

Summary of Research on Qing-Dynasty Porcelain

项坤鹏

Xiang Kunpeng

内容提要：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瓷器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以景德镇产品为主的清代瓷器遍及各地。关于清代瓷器生产、流通及赏鉴等方面，古代文献中有着大量的著录，主要载录于清宫档案、官方史志和私人文集之中。近现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窑址、墓葬、沉船、城址等遗迹中不断有清代瓷器出土。大量的文献，丰富的考古材料，再加上规模庞大的博物馆藏品，为清代瓷器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外学者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多集中在对瓷器产品本身的研究、对御窑生产制度的研究、对清宫用瓷制度的研究和科技分析研究等方面。

关键词：

清代瓷器 文献 考古 研究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witnessed the last pinnac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rcelain in Chinese history. The Qing-dynasty porcelain as represented by products from the kilns in Jingdezhen scatters across the country. Large quantity of ancient records can be found on the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porcelain pieces of the period, of which a majority is in the Qing palace archives,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nd collections of notes by individuals. Moder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help to continuously unearth ceramic pieces of the period from kiln sites, tombs, shipwrecks, city sites, and other locations. Rich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bundant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vast museum collections provide solid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Qing porcelai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on relevant issues, mostly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the porcelain products themselves, production management of imperial kilns, the use the product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nalysis.

KEYWORDS:

Qing-dynasty porcelain, documentation, archaeology, research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瓷器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此时景德镇已经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其他地方的窑场虽然也有生产,但较之前者,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相去甚远。以景德镇产品为主的清代瓷器遍及各地,上贡宫廷,下达民间,远销海外。关于清代瓷器生产、流通及赏鉴等诸多方面,古代文献已有大量著录,近现代以来,中外学者更是不断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为回溯既往研究,以明晰清代瓷器研究的发展脉络,本文拟对相关成果举要评介。

一 古代文献记载

与宋、元乃至更早时期不同,清代与瓷器有关的文献颇多,除了零星、片段化的记载,还有专著进行综合性的论述。按照文献性质,可将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宫廷档案,如清宫奏折文稿、贡档进单和清档簿册等;第二类为官方史志载录,如《清实录》《清会典》《浮梁县志》等;第三类为私人笔记、文集,如《陶说》、《景德镇陶录》等。以下分别述之。

(一) 宫廷档案

清代宫廷用瓷主要是由御窑厂组织并生产的,清代宫廷与御窑厂瓷器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御窑瓷器在清宫中的使用情况等,于清宫奏折文稿、贡档进单、清档簿册等¹档案中多有记载。

奏折文稿包括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附奏折(雍正至宣统八朝),内务府呈稿(嘉庆至光绪五朝),内务府来文(乾隆至宣统七朝),内务府奏案、内务府奏底以及内务府的咨文、领文、呈文(乾隆至光绪六朝)等,涉及机构颇多,包含事务繁杂,从中可获取大量清宫使用瓷器以及景德镇御窑厂组织烧造瓷器方面的信息²。

贡档进单主要包括宫中进单(雍正至光绪七朝)、宫中贡档(乾隆至道光三朝)。宫中进单是指各地总督、巡抚、布政使、将军、总兵、河道漕运、八旗都统、税关、盐政、织造等官员以及皇亲贵戚等按例向历朝皇帝、皇后、太后进贡物品的单摺;而宫中贡档是养心殿造办处办事人员抄录贡单上的贡物名称、数量、记录皇帝的旨意(关于贡物发落或驳回)的档簿。透过贡档进单可知,除了景德镇御窑产品之外,清宫瓷器还有其他来源,关于清时瓷器贡进种种,贡档中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载³。

清档簿册,包括内务府堂清册(道光至宣统五朝)、内务府黄册(乾隆至宣统七朝)、内务府陈设册(乾

1 参见铁源、李国荣:《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

2 如:“(雍正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宫殿监督领侍陈福、宫殿监副领事苏培盛、刘玉传旨:康熙年间瓷器曾降旨着另行收贮,此项瓷器既系永远收贮,不必放在架子上,着以圆明园旧有木桶及盛新瓷器,木桶装好永远敬谨收贮。”(参见前揭《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一“雍正九年”,第145页)。这则文献展现了清宫中瓷器使用过程中的一个细节——除了帝王后妃的日常用度以及祭祀、陈设等使用方式外,还曾有一小部分康熙瓷器被雍正皇帝下令“永远收贮”。又如“(乾隆十五年)管理九江关税务奴才惠色跪旨事,窃奴才仰蒙圣恩,监督九江关税兼管窑务,除现在敬谨办理小心制造外,伏查前人监督唐英每年开工止工春秋两次赴窑查办瓷器,其关税事务交九江府知府暂管。又经具奏在案,今奴才接任后正值窑务开工,即应赴厂查办,其关税事务应否仍交九江府知府刘炳暂行代管?奴才未敢擅便,理合恭摺,奏明伏乞皇上批示遵行。为此谨奏。(依唐英之例行)”(参见前揭《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三“乾隆十五年”,第267页)由此可知,当时唐英、惠色等均职掌九江关税兼管窑务,不在景德镇常驻,而是每年春、秋两次赴窑查办瓷器。

3 臣属进贡即为其中之一,如:“原太仆寺卿加三级准用二品顶带服色奴才范毓麟恭进:脂玉鱼龙花瓶一件……宋哥窑葵花碟一对、成窑鱼藻花瓶一件……(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范毓麟恭进古董十八样,圈了九样,打○九样不收,按数驳出,记此)。”(参见前揭《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二“乾隆五年”,第4页)另外还反映了宫廷及民间对各色瓷器的认知:宋哥窑、明成化窑瓷器在乾隆时已然成为求之难得的珍品。

隆至宣统七朝)、广储司簿册(乾隆至宣统七朝)、御茶膳房簿册(乾隆至光绪六朝)、宫中陈设册(乾隆至宣统六朝)、造办处活计清档(雍正至光绪七朝)、宫中库储档(雍正至宣统八朝)等。内容涉及御窑管理制度、瓷器烧造过程及瓷器使用收贮等诸般细节,多为以往文献所不见¹。

除了以上,还有陈设档。陈设档有原始档、复核档和日记档之分。原始档,即某一殿堂陈设物品的原始清册;复核档,是根据原始档对陈设物品进行复查时,对发生变动的陈设品,在原始档中相应的陈设物品名称下面粘贴浮签,以墨注明其来源或去向,以示其变动情况而形成的陈设清册;日记档,即随时记录某一殿堂陈设物品的变动情况而形成的清册²,据此可知当时宫中瓷器陈设及变动等情况³。

(二)官方史志载录

除了宫廷档案,清代瓷器的一些情况也见载于史志类文献之中,包括《清实录》《清会典》《起居注》“续三通”、“清三通”、《清史稿》《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浮梁县志》《龙泉县志》等。

《清实录》⁴是利用原始档案,以编年体而辑成的清代各帝统治时期的大事记,所载史事较为详细可靠,与瓷器相关的内容较多,包括祭祀用瓷事⁵、烧瓷用银事⁶、赏赐事⁷、查核瓷样事⁸、究讯御窑协造者事⁹、土贡事¹⁰、

1 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库掌宝禄太监赵禄来说,内殿总管沈魁交白玉花插一件无座,白玉羚羊一件,紫檀木雕花山石座;白玉悬磬一件,紫檀木雕花架;霁红大碗二件,紫檀木雕花架座,碗二件有微璺;青花白地瓷瓶一件,紫檀木云板腿座;古铜三足炉一件,紫檀木荷叶座,木盖玉顶;古铜双耳瓶一件,无座;古铜花插一件,无座;古铜罐一件,无座。传旨:著将陈设十件粘补出土见新,其无座陈设着配做紫檀木烧饼座,玉磬上另换条绳。钦此。”(参见前揭《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三十二“道光二十三年”,第18页)其中提到“霁红大碗二件……有微璺”,“著将陈设十件粘补出土见新”,据此可知,部分御窑瓷器即使有微璺,也不会被宫中抛弃,而是会被送至造办处粘补见新。又如:“(嘉庆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广储司瓷库呈为办办粗瓷领取银两事查得库贮粗瓷盘三百九十六件,大碗一百八件,茶盅五千三百五十二件,碟子一千七十二件,共计七千五十八件,年例每逢皇上巡幸清茶房等处沿途应用,并各坛庙、中正殿、雍和宫等处念经道场传用往返抬运沿途破碎亏折过多,于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内呈明照依库内粗瓷七千五百五十八件之数,每年请按三成添补,其价银向官房租库领取取补,谨将粗瓷细数并办办价值另缮粘单一并呈明可也。”(前揭《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二十六“嘉庆四年”,第408页)可知清官中所见所用的不仅是御窑瓷器,同时也会购买一批粗瓷用于“皇上巡幸清茶房等处沿途应用,并各坛庙、中正殿、雍和宫等处念经道场”。

2 李福敏:《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务府陈设档》,《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

3 如《乾清宫东暖阁炕上陈设档》载:“东暖阁炕宝座上设……左边设五彩磁白地蒜头瓶一件,大明嘉靖年制,紫檀木座,养心殿来。……定磁平足洗一件,铜镶口,紫檀木座内,宁寿宫来。”(参见故宫博物院“清宫陈设档”电子版。)据此,乾清宫东暖阁当时的瓷器陈设一目了然。

4 纂修《实录》为唐旧制,后世因循沿袭。有清一代先帝死后由嗣君特命开馆纂修。《实录》馆为临时机构,每开馆即调取大量上谕、奏折、起居注及其他原始档案,由纂修官理清年月、按例纂修。

5 如“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参见王光越总编: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〇六“乾隆十三年正月上·乾隆十三年戊辰春正月”条,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同,第2页。

6 如“九江关监督办理尤拔世奏请将监督养廉……九千两移为烧造瓷器之用”。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二一“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下·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九月”,第15页。

7 如“颁赐安南国王……瓷器等事”、“本年九月十五日之事,逆首林清与李文成二人内外勾结,约定同日起事……该将领及满汉官兵倍常奋勇,宜加优奖……又发去瓷翎管十个、瓷搬指套十个,分赏出力官弁”。参见《清实录》“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七九“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下·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一月”,第18页。

8 如“又伊犁阿另摺奏景德镇瓷器厂,向存有历任大小样器……经舒善调取存贮,现在向彼查取”。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八一七“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下·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八月”,第33页。

9 如“据何裕城奏,协造德纯自缢身死,遗存诉呈一纸,内有侵用银两金脚,私造瓷器等情节”。参见《清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六七“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下·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十月”,第20页。

10 如“至应进土贡,原为日用所必须……其他如川广之药材、九江之瓷器……仍准按例呈进。所有如意玉铜瓷书画挂屏插屏等物,嗣后概不许呈进”。《清实录》“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上·嘉庆四年己未春正月”,第45页。

英夷索取瓷器事¹、热河瓷器挪用事²、查获偷盗内府瓷器贼范事³、江西申办西式瓷器事⁴、柯逢时奏请创办景德镇瓷器公司事⁵、变价盛京、热河旧存瓷器事⁶等。

《清会典》是记载清代国家体制和各部、院职责的权威文献⁷，所载瓷事以朝贡赏赐居多⁸。此外还包括内廷用瓷烧造、贮藏⁹，坛庙陵寝用瓷烧造、贮藏¹⁰，广储司瓷器库事¹¹，念经应用瓷器事¹²等。

与《清实录》、《清会典》相较，清《起居注》是清帝言行的原始记录，更有真实可信度¹³。涉及瓷事内容除了上述文献所载之赏赐事、挪用瓷器事外，还包括查获窃贼事¹⁴、慈禧停烧瓷器事¹⁵等。

《清会典》中所述及之瓷库职掌，也见于《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则例》属政书，为各中央机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记录，《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为其中之一。关于瓷库所记，两者可相互补充、印证¹⁶。

- 1 如“朕闻英夷前在定海，曾向伊里布索取瓷器，迨经送去，该夷因不合意退还”。参见《清实录》“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四八“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上·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三月”，第10页。
- 2 如“前任热河副总管钟英随同毓泰，并所存瓷器交给肃顺借用，于查讯之先，亦未声明，均属疏忽。钟英著即卸任”。参见《清实录》“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一三“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第24页。
- 3 如“又谕，巡视东城御史文博等奏，拏获偷盗内府瓷器贼范并买赃人犯，请交刑部审办一折”。参见《清实录》“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七“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上·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冬十月”，第5页。
- 4 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江西绅商稟请创办内河小轮西式瓷器、蚕桑学堂以扩商务”。参见《清实录》“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八五“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月”，第3页。
- 5 如“柯逢时奏创办景德镇瓷器公司，下部知之，改铸江西丰城县印信，从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请也”。参见《清实录》“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五一六“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下·光绪二十九年乙癸卯五月”第21页。
- 6 如“甲戌，谕内阁，总理大臣署度支大臣片奏，库空如洗，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参见《清实录》“大清宣统政纪（附录）”卷六七“宣统三年十一月上·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第15页。
- 7 有清一朝编有五部会典，分别修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目前多以光绪朝所修《会典》为本。
- 8 如“五十一年，赐朝鲜国王玉如意一、玉器二、砚二方、绢笺四卷，笔、墨各二匣，洋瓷珐琅盒、瓷器、玻璃器、雕漆盘各四件”。参见《清会典》之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三》卷五〇七“礼部一八·朝贡·赐予二”，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历朝《清会典》皆为同类版本，不一一赘述。
- 9 如“凡上用瓷器照内颁式样数目行江西饶州府烧造解送，凡坛庙陵寝需用祭器，照太常寺图式颜色数目颁发江西烧造解部”。参见《清会典》之康熙朝《大清会典一》卷一三六“工部·都水清吏司·器用”。
- 10 如“顺治年间定各祭祀需用祭器收贮神库，本寺官时行稽察，如有损坏即知会工部修理，其所用瓷器不敷，咨工部转行该省豫期照式烧造”。参见《清会典》之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卷一五二“太常寺”。
- 11 如“（广储司）设立六库……瓷库掌瓷器及铜锡器皿。国初设御用监，顺治十二年奏准各库钥匙每晚交送内廷收贮。十八年改设银库、段库、皮库、衣库分掌给出。康熙四年奉旨各库钥匙交乾清门直宿侍卫班领。十七年奏准内务府所奏本章令广储司银库收贮。十九年命内务府工部司官各一人往江西烧造瓷器……二十七年奏准停止江西烧造瓷器。二十八年增设茶库、瓷库。……瓷器库铜、锡、铅等如不敷用者移咨户部领取。……雍正四年奏准，凡开库，令库官、司库、未入流司库各一人库使三人公同启封，事毕，照例封识，如遇夜间开库，直宿司库传集六库直宿之库使，从直宿之总管率领开库，再向例库钥匙直宿库使二人每晚汇交乾清门直宿侍卫，次日仍由库使二人领回分给各库。嗣后六库每日令库官一人直宿，其去送库钥令直宿司库率库使二人司其事。每晚封库后交守库直宿护军校等看守。次日库官验看封识。是年遵旨复委内务府官一人于江西烧造瓷器。五年奏准烧造瓷器向用正帑，今改于准关银内动支，瓷器解送到日拣选留用外，余交库收贮备用。坛庙奉先殿所需祭器有不敷用，奏交江西瓷窑敬谨造送。……（乾隆）五年奏准江西烧造瓷器动用九江关税银”；又如“武英殿之南为外瓷器库，稍西为南薰殿”。《清会典》之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二》卷六六一“工部·宫殿·外朝之制”。
- 12 如“凡念经需用宝石末由银库……铜镜铜锡瓷器皿由瓷库”。《清会典》之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三》卷九八“内务府·中正殿事务”。
- 13 历朝清帝均有详尽起居注记载，且基本都完整地保存下来，分藏于两岸。
- 14 如“一摺拜唐阿存志等胆敢偷窃园寝软片瓷器，殊为藐法，存志秉义均著交刑部严行审讯，按律治罪”。参见如“一摺拜唐阿存志等胆敢偷窃园寝软片瓷器，殊为藐法，存志秉义均著交刑部严行审讯，按律治罪”。
- 15 如“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户部奏内务府传办九江关瓷器一摺，此时局多艰，财用匮乏，本年万寿庆典业经降旨不准铺张，所有传办瓷器著即停止”。参见《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清德宗》卷七一“光绪三十年七月”。
- 16 关于清官瓷库职掌，《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曰：“瓷库专司收存金银器皿并古铜珐琅镀金、新旧瓷、铜、锡器等物。银作需用红铜索丝、铜、锡，熟皮作需用铜丝、铜条、铜铃、云口压条、铜轘，铜作需用铜钉、铜丝，衣作需用镀金铜钮，花作需用红铜豆条，俱向瓷库领用。内庭遇喜，分例所用铜、锡、瓷器，不拘数目，据宫殿监督领侍等传交瓷库，照数给与。江西烧造瓷器，烧造贡送呈进拣选留用外，其余交库收贮，以备内庭及各处应用”。转引自章乃炜等编：《清官述闻》，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此外《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还载有烧瓷用银事等,较《清实录》所载为详¹。

除了以上,乾隆皇帝还敕令撰写《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前三者被称为“续三通”,后三者被称为“清三通”。“续三通”叙事至明末,材料多取自宋、元、明史,“清三通”上接“续三通”,叙事止于乾隆五十年,材料多来源于当时文献。1921年,刘锦藻又编成《清朝续文献通考》,叙事止于清宣统三年。涉及瓷器的内容除了前述文献所载之赏赐事以及变卖盛京、热河瓷器事外,还包括与外邦互市事²、税收事³、道光年停烧瓷器事⁴等。

此外《清史稿》也有相关记载。《清史稿》是民国初年所设清史馆编写的清代历史的未定稿,全书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其中与瓷器有关的内容除了赏赐之事外,还着重提到了两位督陶官刘源⁵、唐英⁶及其制瓷事宜。

史籍以外,还有皇帝或官方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专题载录。如乾隆皇帝曾令人绘《陶冶图》并撰《陶冶图说》,对景德镇制瓷流程进行了形象且直观的描述。《陶冶图》有图二十幅,《画史丛书·国朝院画录》载:“孙祐、周鲲、丁观鹏合画《陶冶图》一册。”《陶冶图说》也称《陶冶图编次》,是《陶冶图》的文字说明。据唐英奏折《遵旨编写在〈陶冶图说〉呈览折》载:“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二日,接到养心殿造办处移会公开,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由内廷交出《陶冶图》二十张,奉旨:‘着将此图交与唐英,按每张图上所画系何技艺,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或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夫取料、取水之处,皆写明地名,再讲此图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第编明送来。钦此。’”《陶冶图说》共分二十段,包括:采石制泥、淘练泥土、练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圆器拉坯、琢器做坯、采取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旋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彩、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祀神酬愿⁷。唐英以督

1 如“康熙十九年十月遵旨,……动用江西藩库正项钱粮,烧造瓷器,以供内用。所用钱粮,由工部奏销。……雍正五年二月奏准,停用正项钱粮,于淮关盈余银两内动支烧造……所用钱粮,岁底呈销内务府。……嘉庆四年十二月议复奏准,九江关烧造瓷器,每年动支该关盈余项下银一万两,约用银七千余两,余剩银解交造办处……道光二十七年五月,本府奏准,嗣后每年九江关烧造大运瓷器,……所需工价银两,不得过二千两……”。转引自《中国瓷器古籍集成》,第171页。

2 如“柔佛属国有丁机奴、单咀、彭亨,雍正七年后皆通市不绝,丁机奴在西南海中,四时皆暖,虽隆冬无霜雪,崇山峻岭蜿蜒相望,风俗略同柔佛,土产胡椒之美甲于他番,余则沙金、冰片、沙藤、速香等物,其国人终身不出境,无航海而来中国者,每岁之冬春闲,粤东本港商人以茶叶、瓷器、色纸诸物往其国互市。(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二九七“柔佛”,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又如“乾隆五十八年赐英吉利国王敕书曰,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五七“市糴考二·市舶互市”。)

3 如“(光绪二十九年)臣前往藩司任内适值赔款期,迫特设商务局认真考察随时详定护理抚篆后仍督同局员实力整顿,先将大宗货物如吉赣抚建两河之木……景德镇之瓷器……一律次地改就统捐”。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七“征榷考十九之杂征”。

4 如“(道光)二十九年江西九江关监督士魁奏制造圆琢瓷器名目件数得旨句除者十六项目本年永停烧造,此册发往九江关监督衙门……”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三“国用考一”。

5 “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要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技巧绝伦,……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其它御用木漆器物,亦多出其监作。圣祖甚眷遇之。”参见《清史稿》“列传二九二·艺术四”,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

6 “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历监粤海关、淮海关。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余年。明以中官督造,后改巡道,督府佐司其事,清初因之。顺治中,巡抚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称郎窑。其后御窑兴工,每命工部或内务府司官往,专任其事。年希尧曾奉使造器甚伙,世称年窑。英继后,任事最久,讲求陶法,……撰《陶成纪事碑》,奉敕编《陶冶图》……”参见《清史稿》“列传二九二·艺术四”。

7 如“采石制泥”条载:“石产江南徽州祁门县坪里、谷口二山,距窑厂二百里。开窖采取,剖之,中有黑花如鹿角菜者,土人借溪流设轮作碓,春细淘净,制如土砖,名曰:白。色纯质细,用制脱胎、填白、青花、圆、琢等器。别有高岭、玉红、箭滩数种,皆出饶州府属境内,采制法同白,止可参和制造,于粗器为宜”。[清]唐英:《陶冶图说》“采石制泥”条,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250页。

陶官身份浸淫景德镇御窑瓷业数十年，其著录可以算是对御窑制瓷过程最详实且可靠的记载。

《皇朝礼器图式》《备物昭诚》¹等内府彩绘本典制书籍对乾隆及其以后祭礼中所用的瓷器进行了形象描绘。《皇朝礼器图式》²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后经增补，于乾隆三十一年由武英殿修书处刻版印刷，乾隆三十八年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其内容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祭器，计二卷，所祭者有十一坛九庙二殿，即天坛、祈谷坛、地坛、社稷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天神坛、地祇坛、太岁坛、奉先殿、传心殿、太庙、文庙、帝王庙、先医庙、都城隍庙、内城隍庙、永佑庙、天下第一龙王庙、昭陵沛泽龙王庙，所绘瓷质祭器有登、簠、簋、豆、鬶、尊、爵、盞共八种，釉色包括黄、白、赤、青、月白诸色³。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是在民国时期清室善后委员会根据当时清点宫故规则，严格清点故宫物品后所列出的物品清单。共六编二十八册，各编以各宫、殿、堂、园为单位分册，注明物品名称、件数，并加以编号，注明制造年代、残缺状况、包装形式等项。据相关记载可知瓷器在当时（民国点查之时）清宫中的分布及陈设状况⁴，并与前述清宫陈设档形成一种时间纵轴上的呼应关系。

除了上述官方史籍典志记载外，官修地方志中也对清代瓷器的相关情况有所记录，以景德镇官、私窑场为主，但也有涉及其他地方窑场生产者。前者如《浮梁县志》⁵，书中提到了顺治十一、十六、十七年及康熙十年等烧造御窑瓷器事，并对高岭土的情况作了较细描述⁶，此外还记录了魏氏砌窑之事⁷，可知彼时景德镇窑业分工之细。又如《江西通志》⁸除载有顺治、康熙年烧造瓷器事外，还载有龙缸窑、青窑的烧造细节⁹。再如《饶州府志》¹⁰、《南康府志》¹¹等，对顺治、康熙初年烧瓷、瓷窑补砌以及瓷土挖取事进行了记载。后者多为江西以

1 《备物昭诚》一函六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卷首有乾隆御笔“报功致恪”四字，并钤有“乾隆御笔”章。不过，通书前后均不载绘制年月和画工姓名，故其成书时间和画人姓名均待考。但以是书与《皇朝礼器图式》对校，知其所载尽同于后者卷一之祭器部。参见王光尧：《清代瓷质祭器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

2 《皇朝礼器图式》现存有乾隆三十一年武英殿刻本、内府彩绘本、内府毛边本和光绪朝重印本。

3 举例如，“夕月坛正位尊，谨按乾隆十三年钦定祭器，夕月坛正位尊用月白色瓷，形制大小同”。《皇朝礼器图式》卷一“祭器一”。

4 如“（第五编卷五皮库·瓷库）……粗瓷杯盅碟等三十一个……宣德款白地青花寿字盘十六个、宣德款白地青花碗五个、宣德款白地青花碗五个、宣德款白地青花盘一个（以上共盛一木匣）”。《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五编第二册卷五“皮库·瓷库”（05920，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一日）。

5 现存数本，分别为康熙、乾隆、道光年间所修。有王临元修，曹鼎元纂《浮梁县志》康熙十二年刻本，国家博物馆藏。另有王临元修，曹鼎元纂康熙二十一年刻本，九卷，卷首：境图，旧叙；卷一：舆地；卷二：天文；卷三：建置；卷四：赋役；卷五：官师；卷六：选举；卷七：人物；卷八：艺文。其中卷四赋役之陶政收录《陶记》。现原本藏于景德镇市图书馆。还有程廷济总修，凌汝绵编纂乾隆四十八年刻本油印本，十二卷，卷一：疆域；卷二：建置；卷三：学校；卷四：典礼；卷五上：食货；卷五下：物产；卷六：官司；卷七：选举；卷八上、下：人物；卷九：列女；卷十：名迹；卷十一：艺文；卷十二：杂记，其中卷五下物产之陶政篇收录《陶记》、《陶冶图编次》。再有乔淮修、贺熙龄纂道光十二年刻本，二十二卷，其中卷八食货之陶政篇收录《陶冶图编次》、《陶记》该书时间跨度大，记录完备，考核精详，后人著述多引征于此。参见洪卫宁、桂丽珍：《〈浮梁县志〉与景德镇陶瓷研究》，《景德镇陶瓷》2005年，第15卷，第2期。

6 “高岭在县东七十里仁寿都，与婺之石城山连界，险峻特甚，黄巢之乱，乡民保之，有黄梅寨、走马冈、双井泉。元季，于光将李昌寨守之。居民有强悍风。今其山产磁土，民取以为业”参见康熙《浮梁县志》卷一，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88页。

7 如“而窑之高、卑、阔、狭、大小、浅深暨夫火膛、火栈、火眼、火尾之規制，种种不一，精其工而供其役者，为景镇魏氏专其业，而得其传，元明以来无异也。故砂土无常工，而群窑之结砌、补葺，则业有专属，他族无与也。国朝康熙十三年，吴逆煽乱，景镇民居被毁，而窑基尽圯。大定后，烧造无从，又魏氏子弟各出其工，分承窑脚，尽为整理，而圯坏如新故。御器烧自民窑，供役虽停而结砌修葺，则仍魏氏世守，此皆陶政所关，而亦民业所系，因备记于册”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卷五，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90页。

8 《江西通志》也有颇多版本，刊印成书的包括康熙、雍正、光绪三朝所修《江西通志》以及康熙朝之《西江志》。

9 “窑座前宽六尺，后如前，饶五寸，人身六尺，顶圆鱼缸大样二样者，止烧一口，瓷缸三样者，一窑结砌二台，则烧二口，溜火七日夜。溜火小火也，如水滴溜，小小起火，使水气渐干渐熟，然后赶紧火二日夜。见缸匣既红，而复白色，前后皆明亮，方可止火封门。又十日窑冷方开。每窑约用柴百二十扛，遇阴雨或加十扛”康熙《西江志》卷二七，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86页。

10 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95页。

11 盛元等：《同治南康府志》卷四，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199页。

外的其他地方志,比如《龙泉县志》¹即对清代浙江龙泉地区的瓷器生产情况有所载录²,表明清顺治时期琉田大窑仍有青瓷窑,而庆元竹口一带窑户稀绝。此外,康熙十一年刊刻的《庆元县志》³、雍正十一年刊行的《处州府志》⁴中均有当地物产青瓷的记载。

(三) 私家笔记、文集等

自宋以降文人笔记勃兴,明清时期不仅数量众多,且质量亦属上乘。清代私家笔记中涉及当朝瓷器者为数不少,以《陶人心语》《陶说》《南窑笔记》《景德镇陶录》《陶雅》《饮流斋说瓷》等书影响较大。简述如下:

《陶人心语》是唐英的个人诗文集,最早由唐英幕友顾栋高整理选订,于乾隆三年编成,该本共五卷,卷一至卷四为诗,卷五为杂著。收录诗文的写作时间始于雍正六年八月,止于乾隆四年三月。该本于乾隆五年由唐英弟子施雨田写刻,由唐氏古柏堂刊印。另外,乾隆三年,唐英又请顾栋高在筛选后的诗文中选订成《陶人心语续选》二卷,只收录诗歌,诗歌的写作时间始于雍正六年十二月,至于乾隆三年九月。此后唐英又有续作,每积一两年诗文编选录成册,结集出版,终成《续选》十四卷,除了前二卷外,其余十二卷均由唐英自选自刻,写作时间大约可至乾隆十五年⁵。《陶人心语》及《续选》的内容涉及唐英生平及其在陶艺、诗文和戏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研究唐英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清初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管理不可或缺的文献之一⁶。

清佚名《南窑笔记》,约成书于雍、乾年间,全书不分卷,共有札记35条,其中记古窑7条,明窑6条,重点对景德镇陶瓷原料的产地、性能、用途,各工序的分工情况,窑炉的构造以及青花料的产地进行了叙述⁷,诸般细节,描述可谓详尽。

《陶说》可谓我国第一部陶瓷史著,朱琰“丁亥岁馆于江西大中丞吴公宪署,因得悉景德窑器之制,撰成《陶

1 有顺治、乾隆、光绪等版本。

2 顺治十二年傅梦麟纂修:《龙泉县志》卷四《食货志》“青瓷窑”条载:“琉田、道泰、大其垵、安福、蛤湖、因溪垵、官田、俞溪、大浪坑”,“瓷窑昔属剑川,自析乡立庆元县,窑地遂属庆元,去龙邑几二百里。不知者尚搜之剑川,舟舆踳踏,地方驿骚,两邑均任其责。且竹口一方,迩来闽寇闯入,烧毁民居,窑户稀绝,以鸠鸽子遗应不次供办,噫,其亦难矣”。[清]徐可先修,胡世定、傅梦麟纂修:《(顺治)龙泉县志》卷之四《食货志·坑场》“青瓷窑”条,卷四叶三十五—三十六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顺治十二年(1655)刻本。

3 [清]程维伊等纂修:《(康熙)庆元县志》卷三《食货志》“物产”:“……惟货有苧桐油、茶油、蜂蜜、香草、青磁器之类”,叶八左,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十二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康熙十一年刊本,1983年,第162页。

4 [清]苏遇龙修,沈光厚纂:《(乾隆)龙泉县志》(乾隆二十七年修,同治二年补刊本)卷三《赋役志·物产》“货之属”附“青瓷窑”条,卷三,叶十八左,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六〇六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第212页。

5 据陈宁考证,《陶人心语》有包括顾编本、自编本、合刻本、稿本、华编本在内的几个版本。其中所收录的内容源流传承,有所不同。参见陈宁:《督陶官唐英〈陶人心语〉版本流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

6 如《唐英全集》第一册“高序”中载:“唐俊公先生自幼与子同侍内廷……相与同殿侍直者几十年。予乃迁职。自是予两人不复常相见。盖二十余年。丙辰之春,先生以奉命督榷准关,来自西江陶署。”参见张发颖主编:《唐英全集》第一册,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7 如“料有数种,产于浙江、江西、两广,以出于白土者为上品,红土次之,沙土最下。其制法:选择好者,洗净入窑,燥一昼夜,乳极细,去其土锈,即今画碗之青花料也。其浙料有元子、紫料、天青各种。而江西有筠州、丰城。至本朝则广东、广西俱出料,亦属可用,但不耐火,绘彩入炉,则黑矣。故总以浙料为上,重则浓红,轻则淡翠,入炉不辨老少。头出者稀少难满。新山出者次之。若江西料差,次于浙料,而广料又次于江西矣。配料之法:浙料为主,佐以紫料,然不若元子独用为全耳。嘉窑有回青料石。胭脂胎、铁胎二种,俱出西洋,今不能得”。[清]佚名:《南窑笔记》,载《古瓷鉴定指南(三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说》六卷”¹。首刊于乾隆三十九年，全书共分六卷，其中论及清代瓷器者，为卷一《说今》篇，概述了御窑厂的设立时间及运行机制，列举了景德镇诸窑场的主要成就，并收录了唐英所著《陶冶图说》。

《景德镇陶录》为清景德镇人蓝浦原著，约成书于乾隆末年，蓝浦卒后，由其弟子郑廷桂增补为十卷，并于嘉庆二十年付梓²。该书卷一“图说”对景德镇及御窑厂的地理位置、建筑格局、陶务分工及制瓷流程等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³，并言明“以上诸说（制瓷过程）多采唐雋公陶冶图说”，两者前后对比，内容基本相同，略有出入。卷二“国朝御窑厂恭记”记载了御窑厂的始建时间、督造人选、岁解运数、工食人役等。

《陶雅》为陈浏所著，初名《瓷学》，又名《古瓷汇考》，出版于清宣统二年⁴。该书是作者收藏与鉴定瓷器的经验总结，对陶瓷发展的源流、瓷器名称、胎质、釉色、装饰技法、款识等各个方面的特征以及历代名窑、制瓷名匠、市场供销等情况都有描述，尤以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为详⁵。

《饮流斋说瓷》为许之衡所著，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下两卷，分概说、说窑、说胎釉、说彩色、说花绘、说款识、说瓶罐、说杯盘、说杂具及说疵伪十章，由古及今，以清代瓷器为重⁶。部分内容似与《陶雅》有可呼应之处⁷。

上述《陶雅》《饮流斋说瓷》为清末民国时期著作，这一时期由于清朝政权被瓦解，原藏于宫廷的御窑瓷器流入民间甚至海外，文人藉此机会对包括清代瓷器在内的中国古代陶瓷器展开鉴赏与研究，不乏著述涌现。较为重要的著作还包括：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佚名《瓷鉴》、郭葆昌《瓷器概说》、黄裔《瓷史》、赵汝珍《古玩指南》、杨啸谷《古月轩瓷考》等。

要之，清及民国时期文献众多，对清代瓷器的记载是全面、具体的，各有侧重，可互相补充：宫廷档案主要以记录宫廷与地方窑场（主要是景德镇）的联系以及瓷器在宫中的使用情况为主；官方史志则主要以记

1 最初刻本是乾隆三十九年鲍廷博本，但初未列《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刻本是乾隆五十九年马俊良《龙威秘书》本。以后刻本渐多，有《翠琅环馆丛书》本、《艺术丛书》本、《芋园丛书》本、《美术丛书》本、《说荟》本等，有刻本、铅印、石印之不同。西方人也颇重此书，1856年法国人儒莲（M.S.Julien）有节译本，1891年英国人布希尔（S.W.BuShell）有全译本，并于1910年付印。参见傅振伦：《朱琰〈陶说〉简介》，《景德镇陶瓷》1981年第2期。

2 有嘉庆二十年异经堂刻本、光绪十七年京都书业堂重刻本、民国十七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本数个版本，且于1856年由儒莲译成法文出版，于1907年由日本藤江永孝编辑出版《和汉对照〈景德镇陶录〉》。

3 如“取土”条载：“陶用泥土，皆须采石制练。土人设厂采取，借溪流为水碓春之澄细淘净，制如砖式曰白。以徽州祁门为上，出坪里、葛口二山。开窖采取，剖如黑花如鹿角菜形者佳。此土色纯、质细，可制细器。别有高岭、玉红、箭滩数种，皆以所产之地名。若黄釉果尤作粗瓷者必需。其采制法同幅中，为开采，为碓春大略如是。”[清]蓝浦：《景德镇陶录》，转引自《中国陶瓷古籍集成》，第351页。

4 伍跃、赵令雯点校整理：《古瓷鉴定指南（初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页。

5 如“蓝色之最淡者，曰天青，青色之较浓者，曰天蓝”；“雍正年代不多，而官窑款式三变。初年大抵双圈六字楷书款。中叶则不用款识，盖以瓷器易毁，不愿将一代年号，委诸粪土中（康熙初亦曾禁款识）也。晚季仍复着款。诚以国初瓷器之美，上掩朱明，阙而不书，后世何征？惟再变而用篆书，盖戛戛乎入乾隆矣。乾隆篆书款十居六七，然亦有用楷书者。雍正之季，始改用篆书，而在康熙朝亦偶一见之，惟系雕款之罩釉者，则真绝无仅有者，或曰是雍正之仿康熙者”；又如“康熙彩，画手精妙，官窑人物，以耕织图为最佳。其余龙凤番莲之属，规矩准绳，必恭敬止。或反不如客货之奇诡者，盖客货所画，多系怪兽老树，用笔敢于恣肆，西人多喜购之”；“康熙画龙，其眼较长，乾隆朝之龙眼，则正圆矣”。

6 如“康熙仕女，其绘弓鞋纤纤者，雅人所鄙，而价值辄累千金。乾隆贡品，绘碧瞳卷发之人，精妙无匹，西商争购，值亦奇巨也。若绘八蛮进宝、群蛮校猎等巨盘，虽稍次之，近亦如凤毛麟角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7 如《饮》书载：“康熙画笔以清代冠，人物似陈老莲、萧尺木，山水似王石谷、吴墨井，花卉似华秋岳，盖诸老规模也，沾溉远近故也。雍正花卉，纯属恽派，没骨之妙，可以上拟徐熙，草虫尤奕奕有神，几于误蝇欲拂。人物山水则稍不如康，然先正典型，犹未之坠。乾隆大兴锦地花，参入泰西画法，俗谓之规矩花，镂金错彩，叹观止焉。人物细微，毫发毕现；翎毛尤极工致，均以古月轩为极，则又与蒋南沙、沈南苹等把臂入怀矣。道光精者，亦如改七芑、王小梅，此盖一代画笔与一代名手相步趋，故一望其画，已知为某朝某代之器也。”（上揭《饮流斋说瓷》，第22页）而《陶雅》亦载：“康窑山水似王石谷，雍窑花卉似恽南田，康窑人物似陈老莲，道光人物似改七芑”（[清]陈浏著：《陶雅》，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

载御窑瓷器的烧造、管理制度,政府机构对瓷器在对外贸易、赏赐等方面政策为主;私家笔记多是文人听闻或者制瓷参与者、鉴赏者心得的体现,主要以记载与瓷器烧造相关的工序、材料以及瓷器赏鉴过程中的细节为主。总体而言,前二者为宫廷或政府有司负责编纂,可信度较高,而后者虽其中内容不乏可取之处,但多有重复甚至传抄的地方,良莠不齐,为一家之言,以今日观点视之,有颇多讹误之处,需得注意。

二 考古出土情况

与清代瓷器有关的正式考古调查、发掘,一般是从20世纪以后才逐渐展开的,尤其是国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规模发展。相关考古材料多见出土于窑址、墓葬、沉船、城址等遗迹之中。

一般说来,窑址的生产具有连贯性,清代窑场的生产多是接续前代而来。清代窑场众多,遍及全国各地,如陕西省耀州窑¹、福建省德化窑²、漳州窑³、东溪窑⁴、磁灶窑⁵,浙江省安吉窑⁶、庆元下济窑⁷、龙泉窑⁸,海南省福安窑址⁹、广西省岑溪市鸡儿社窑¹⁰、山西省六官庄窑¹¹、江苏省宜兴蜀山明清窑址¹²、湖南省桃江县明清窑址群¹³、醴陵市清代窑址¹⁴、重庆市万州冷水溪窑址¹⁵、四川省成都市双流罽罐窑址¹⁶、广东省揭阳市官墩窑址¹⁷、香港大埔碗窑村窑址¹⁸等,但生产状态各异,其中以江西景德镇诸窑场最为活跃。景德镇窑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始自陈万里,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湘湖与湖田一带的几个古窑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研究¹⁹。七十年代,刘

1 刘云辉、周魁英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5“陕西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2 陈建标:《闽南清代陶瓷生产与厦门港对外贸易》,厦门博物馆:《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栗建安:《德化清代窑址的发现及其意义》,郭景坤:《05'古陶瓷科学技术·6·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461页。

3 吴其生:《明清时期漳州窑》,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4 中国考古学会主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5 范清靖主编,何振良、林德民编著:《磁灶陶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6 程亦胜:《浙江安吉发现清代青花瓷窑址》,《景德镇陶瓷》1990年第2期。

7 叶海、刘建安:《庆元县下济清代窑址调查简报》,《东方博物》第五辑,第38页。郑建明、胡文琳、陈化诚:《浙江庆元地区古代制瓷业与庆元瓷文化——2013~2014年调查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4年第2期,总4期。

8 刘净贤:《元明清龙泉窑生产状况及文化因素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5年博士论文。

9 《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第338页。

10 《中国考古学年鉴(2012)》,第355页。

11 山西省文物局编著:《厚重山西 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选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12 《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第209页。

13 《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第355页。

14 201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醴陵窑管理所等单位共同对汾山周围进行了考古调查,共发现窑址84处,其中清代至民国时期窑址78处。参见杨宁波:《2014年湖南醴陵窑考古调查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5年第1期,总第5期。

15 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冷水溪窑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中册)》,第1116页。

16 《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第395页。

17 柏宇亮:《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官墩清代龙窑发掘简介》,《陶瓷考古通讯》2014年第1期,总3期。除了揭阳地区外,广东境内还有清代瓷窑数百处,具体可见曾广亿:《广东瓷窑遗址考古概要》文:“清代陶瓷窑址,分布在潮州、普宁、澄海、揭阳、揭西、惠东、惠阳、惠州、博罗、东莞、高要、连平、始兴、南雄、仁化、翁源、佛山、南海、三水、增城、中山、阳春、吴川、湛江、海康、廉江、遂溪、新兴、连县、阳山、新丰、化州、高州、信宜、兴宁、梅县、蕉岭、大埔、平远、丰顺、和平、五华、龙川、香港(新界大埔)共四十四个县和特区,发现窑址二百八十六处,其中有十二个县和特区烧制青花瓷器(包括香港新界大埔),当时主要采取龙窑烧瓷,未作正式发掘。”《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

18 商志香覃:《香港考古论集》“香港地区窑址和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

19 陈万里:《景德镇几个古窑址的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

新园等学者多次调查了湖田地区的窑业遗存¹。八十年代以来,调查的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大,此后很多学者和文博单位陆续对景德镇窑址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基本摸清了景德镇瓷业的分布规律。景德镇瓷业主要分布于市区及近郊、南河流域及东河流域三个区域。南河流域主要是唐、五代至宋元时期窑场,但落马桥窑址等也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清代瓷器,以民窑为主²;市区及近郊主要是元、明、清时期瓷业,包括御窑厂和观音阁窑址³等;东河流域主要是明、清时期民窑青花窑场。在密集的考古工作中,伴随着对清代御窑、民窑窑址及其产品的清理——以御窑厂发掘为例:1982年至199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市政建设工程,对御窑遗址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从历年考古清理与发掘情况来看,清代御窑堆积很少,清代御窑瓷器在保存完好的状态下被销毁的情况几乎不见,出土的瓷片都比较零散和细碎,未发现像明初御窑遗址那样集中销毁掩埋的堆积。但也发现了一些重要标本,如在清早期地层中发现了一批带“大清顺治年制”款的青花碗盘残片,书有康熙、雍正、乾隆年款的青花、豆青釉等类瓷片,清初官窑试釉照子标本⁴以及同治至光绪朝白地浅绛彩山水人物图盘等⁵;在2002-2004年的发掘中出土了少量的清代早期瓷片⁶,另外还出土有清中晚期的御窑瓷片及“江西瓷业公司”款瓷片⁷;2014年发掘中出土有“大清康熙年制”彩瓷半成品碗、盘以及江西瓷业公司产品残片等⁸;2016年发掘中出土有一定数量清代瓷片,种类包括青花、粉彩、红彩、豆青釉等,器形包括碗、盘、杯、碟、盖碗、梅瓶、鼻烟壶、印泥盒、砚盒、香炉、壶、灯盏、汤匙、高足杯、托盘和杯托等,纹饰以开光人物、莲纹、冰梅、人物故事、山水小景、亭台楼阁、折枝莲、折枝桃、福禄寿喜等为多,款识主要有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大清嘉庆年制”、“大清道光年制”、“同治年制”以及“光绪贰壹年夏源港办用”等⁹。

除了窑址,在全国各地的墓葬中也见有大量的清代瓷器出土,多以景德镇产品为主,也有当地或邻近地区等其他窑场的产品。北方地区如黑龙江省讷河市学田乡工农村清代墓葬中出土康熙青花海水龙纹盘、康熙五彩鱼藻纹盘、康熙素三彩碗、光绪青花人物诗文碗、光绪酱釉青花鱼藻纹碗等¹⁰;河北省高阳县邢家南村李鸿藻墓出土康熙斗彩人物故事图笠式碗等¹¹;天津市蓟县桃园墓地出土清青花花果纹碗、青花釉里红花果纹碗

1 刘新园、白焜:《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第11期。

2 2012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落马桥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2015年9月,共布探方23个,总布方面积826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672平方米,不仅揭露了大量北宋至清末的制瓷业遗迹,还出土了数以吨计的瓷器标本。具体参见翁彦俊:《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宋元遗存的分期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7年博士论文。

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

4 江建新:《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收获及相关问题》,2017年4月江建新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湘湖校区国际学术报告厅的讲座。

5 曹国庆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4“江西卷”,第240页。

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4期。

7 前揭《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收获及相关问题》。

8 钟艳娣:《2014年江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掘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5年第1期,总第5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等:《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2期。

9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6年第1期,总7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6年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新馆)发掘的主要收获》,《陶瓷考古通讯》2016年第1期,总7期。

10 陈雍等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2“天津及东北三省地区”,第239、240页。

11 曹凯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卷”,第240页。

等¹；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城西郊墓出土清康熙青花海兽纹鼓形瓶、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鼓形瓶、清嘉庆豆青釉里红连体双桃形盅、道光釉里红桃形倒流壶等²；陕西省自强路马钢厂东墓葬出土清嘉庆粉彩花蝶纹花口碗、东郊东方机械厂墓出土清康熙青花缠枝牡丹纹将军罐等³。南方地区如福建省浦城县管厝乡清墓出土清代青釉编钟式灯盏、青釉刻划花灯，浦城县万安乡清墓出土青花人物图鸟食罐等⁴；江西万安县润田乡发掘的38座明清墓葬中出土有清代乾隆、嘉庆、道光等朝青花瓷器多件⁵；贵州省贵阳太慈桥青山坡朱姓墓出土清道光霁蓝釉铁锈花如意瓶等⁶。

另外也不乏见窖藏出土的情况。如：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民德路基建工地在南昌佑民寺后院窖藏出土明末天启至清代顺治、康熙时期瓷器83件，包括“双狮戏球”图案青花碗、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五言诗句的青花碟、带“康熙年制”款识的青花杯、带“大清丁未年制”款识的青花盏等⁷；安徽省寿县寿春镇南大街孙家东十房老宅窖藏出土清乾隆白釉暗刻海浪纹盘、乾隆霁蓝釉盘，含山县张町乡窖藏出土清嘉庆青花缠枝花卉纹碗、道光蓝地白花芦草纹茶壶等⁸。

一些沉船遗址及相关水域也出水有相当数量的清代瓷器，这无疑与当时瓷器的外输有关，以景德镇民窑、福建漳州窑、德化窑产品居多，以青花瓷器为主，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瓷也较为多见。包括：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碗礁1号沉船遗址出水有大批清代康熙时期瓷器⁹；福建定海沉船白礁2号沉船出水有明末清初青花瓷器¹⁰；西沙北礁1号、3号沉船出水有清代福建德化、安溪、漳州等窑场所生产的青花及青釉瓷器等¹¹；湄洲湾大竹岛清代沉船遗址出水有景德镇及福建德化窑场生产的青花、五彩和白釉瓷器¹²；南中国海的“泰兴号”沉船出水有18至19世纪福建德化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器形以青花盘、碗、杯、碟、罐、盖碗等为主¹³；南中国海的“哈彻大帆船”出水有一批清初顺治朝福建德化窑生产的白瓷，器形包括觚、杯、炉、壶、碗、观音瓷塑、人物瓷塑等¹⁴；南中国海的“哥德马尔森号”沉船出水有乾隆年间福建德化窑生产的青花瓷和白瓷，器形包括碗、碟、杯、瓷塑人物等¹⁵。越南海域头顿沉船出水有康熙时期江西景德镇、广东汕头、福建德化等窑

1 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2“天津及东北三省地区”，第42、43页。

2 谢治秀等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6“山东卷”，第232～240页。

3 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5“陕西卷”，第233、234页。

4 杨琮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1“福建卷”，第237～239页。

5 余家栋、伯敏：《试析江西万安县出土的民窑青花瓷》，《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

6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6“甘肃青海宁夏云南贵州新疆西藏”卷。

7 余家栋：《南昌发现一批窖藏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4期。

8 李修松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8“安徽卷”，第232～235页。

9 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1“福建卷”，第194～234页；“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编：《跨越海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八城市文化遗产精品联展》，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177～180页；赵家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的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10 赵嘉斌、吴春明主编：《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49、450页。

11 浙江省博物馆编：《扬帆南海——华光礁1号沉船出水文物特展“第二部分丝路沧桑”》，中国文化出版社，第106、107页，2014年；赵家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的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12 郭菁菁：《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王栋云、陈卫平主编：《博物苑》总第十九辑，文物出版社，2012年；赵家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的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13 郑炯鑫：《从“泰兴号”沉船看清代德化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53～256页。

14 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德化陶瓷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15 德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德化陶瓷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场生产的产品,主要品种有青花瓷、白瓷,此外还有少量的青瓷及褐釉、绿釉雕像等¹;越南金瓯沉船出水有大批雍正时期江西景德镇、广东等窑场生产的产品,主要品种有青花、外酱釉色内青花、青花红彩、青花釉下三彩、素三彩、紫红及绿釉刻划填彩、白釉彩绘、酱釉白花、素胎白花、单色釉等²。等等。

除了以上,在国内外的其他遗址出土有为数不少的清代瓷器。国内如北京市故宫南大库遗址出土数万片清代瓷片³、圆明园含经堂假山西部出土有清白釉象形嵌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出土的清代瓷片⁴、朝阳区东直门外德国使馆院内出土清康熙青釉墨彩钟馗坐像⁵;天津市蓟县鼓楼遗址出土有清青花“寿”字铭盘、青花菊花纹盘⁶;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正蓝旗羊群庙乡羊群庙祭祀遗址出土清白釉弥勒佛坐像等⁷;山东省济宁市吕家宅院出土清乾隆仿哥釉笔架⁸等。此外,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美洲等诸多国外遗址中也常见有清代瓷器出土,如在日本江户城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清代瓷器,其中包括福建窑场所生产的青花百寿纹碗⁹;在印尼西爪哇下万丹遗址出土有16-19世纪中国青花瓷器、酱地白花瓷器、三彩瓷器、白瓷器等¹⁰;在印度果阿旧城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清代景德镇青花瓷片¹¹,在马拉巴尔海岸散布着大量的清代瓷片¹²;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一批从伊朗港口城市西拉夫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约为一万七千多件,种类包括石器、金属器、玻璃器和陶瓷器等,其中即包括清代的陶瓷残片¹³;在阿联酋哈伊马角酋长国的祖尔法清真寺遗址出土有清初青花瓷残片¹⁴;在波斯湾巴林国卡拉特巴遗址出土了康熙时期景德镇青花酱釉碗、盏或小盅¹⁵;在东非肯尼亚乌瓜纳遗址中出土有清初瓷器若干件,种类包括青花瓷、霁蓝釉瓷等¹⁶;在美国的希格斯遗址等出土有若干清康熙时期的瓷片¹⁷。

总之,清代瓷器出土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其流布范围遍及同时代的各类遗址。

- 1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中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编著:《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科学出版社,2009年;张凯:《越南出水明清时期外销陶瓷》,《收藏家》2009年第3期。
- 2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中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编著:《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科学出版社,2009年;张凯:《越南出水明清时期外销陶瓷》,《收藏家》2009年第3期。
- 3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南大库瓷片埋藏坑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4期。
- 4 商晓军:《承德避暑山庄出土的清代瓷片》,《文物春秋》2009年第3期。
- 5 于平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北京卷”,第222页。
- 6 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2“天津及东北三省地区”,第44、45页。
- 7 塔拉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4“内蒙古卷”,第238页。
- 8 前揭《中国出土瓷器全集》6“山东卷”,第236页。
- 9 大桥康二著、林佳美译:《日本锅岛瓷器与中国陶瓷的关系》,《陶瓷考古通讯》2015年第2期,总6期。
- 10 辛光灿:《西爪哇下万丹遗址发现的中国瓷器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6期。
- 11 Sila Tripathi, Rohini Pande and V. Gopala Rao, “Study of Chinese Porcelain Sherds of Old Goa, India: Indicators of Trade Contacts”, *Indian Society for Prehistoric and Quaternary Studies*, XXXVI(2), pp.107-116, 2011.
- 12 [日]辛岛升著,程晓中译:《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出土的中国陶瓷片》,《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 13 奈杰尔·武德 赛斯·普里斯特曼:《九世纪唐代与伊拉克青花器物研究新探:以伊朗西拉夫遗址发现为核心》,转引自《陶瓷考古通讯》2016年第1期,总7期。
- 14 张然、翟毅:《故宫考古队员赴哈伊马角调查纪略》,故宫考古微信公众号,2017年9月7日。
- 15 赵冰:《波斯湾巴林国卡拉特巴遗址出土的东亚和东南亚瓷器》,中国古陶瓷学会编著:《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故宫出版社,2008年。
- 16 丁雨、秦大树:《肯尼亚乌瓜纳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
- 17 H.G. 史密斯:《从美国佛罗里达州文化遗址出土的东方瓷器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3年。

三 相关研究成果

丰富的考古材料以及博物馆藏品,为清代瓷器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建国以后,学术理论的日渐完善、对文献档案的逐步整理披露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均促使相关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多聚焦于景德镇产品,主要表现为:

(一) 对瓷器产品本身的研究

对瓷器产品本身的研究以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¹书中所述较详且影响较大,主要从传统鉴定的角度对清代瓷器的造型、纹饰、青花及其他彩料、胎釉特征等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沿袭清末民国《陶雅》等著所体现的文人、古玩行业者之金石赏鉴之道。此外,张浦生、霍华《青花瓷鉴定》²中若干章节阐述了作者对清代青花瓷器鉴定的心得与体会。蔡和璧《清朝的官窑瓷器》³等文,结合社会历史背景,从总体上分阶段对清御窑瓷器进行概述。另外,国内外各大博物馆所刊发的藏品图录⁴及各学术出版机构所编辑的专题瓷器图录⁵,对清御窑瓷器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与观察、思考。还有,相关研究呈逐渐细化的趋势,如款识研究、珐琅彩瓷器研究、“唐窑”研究、某朝某类御窑瓷器具体研究等。

清代御窑瓷器绝大多数署款识,民窑瓷器署款者也多。吕成龙《中国古陶瓷款识》⁶书中对清代瓷器的款识进行了汇总,刘良佑《清代官窑款式概要》⁷文则重点对清代御窑瓷器的款识问题有所梳理,另有王光尧《清代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⁸文对清代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发展演变规律进行了总结。除了上述,R.P. Marchant 也对包括御窑瓷器款识在内的诸多清代瓷器款识进行了探讨⁹。

关于珐琅彩与粉彩、洋彩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刘兰华《谈康雍乾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兼论珐琅彩与粉彩的关系》¹⁰文指出,“珐琅”瓷数种称谓最早见于康熙时清宫档案,而“粉彩”名称最早见于光绪三十二年刊行的《陶雅》,珐琅彩就是粉彩。周丽丽在《有关珐琅彩几个问题的探讨——兼述珐琅彩与洋彩的区别》¹¹文中则认为“洋彩”一词最早见于唐英《陶成纪事碑》,洋彩与珐琅彩是不同品种。廖宝秀在《从

1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3年。

2 张浦生、霍华:《青花瓷器鉴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3 蔡和璧:《清朝的官窑瓷器》,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古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4 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珐琅彩·粉彩”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编集委员会:《清代单色釉瓷器特展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Rose Kerr, *Chinese Ceramics: 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98等。

5 如《世界陶瓷全集15·清》,东京:小学馆,1983年;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中国青花瓷》,香港博物美术馆,1975年;Soame Jenyns, *Later Chinese Porcelain,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2)*,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7; Michel Beurdeley & Guy Raindre, *Qing Porcelain, Famille Verta, Famille Rose 1644-1912*,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等。

6 吕成龙:《中国古代陶瓷款识》,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7 刘良佑:《清代官窑款式概要》,《故宫文物月刊》第41期。

8 王光尧:《清代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收藏家》1999年第6期。

9 R.P. Marchant, "Some Interesting Pieces of Marked Ch'ing Porcelai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Bulletins of Hong Kong*, Vol.3, 1977-1978, pp.50-53.

10 刘兰华:《谈康雍乾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兼论珐琅彩与粉彩的关系》,《文物》1984年第11期。

11 周丽丽:《有关珐琅彩几个问题的探讨——兼述珐琅彩与洋彩的区别》,《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年。此外,同氏还著有《关于洋彩与粉彩的讨论——兼述清代各朝官窑粉彩的特征》一文,见于《上海博物馆集刊》,2005年。

档案内品名看乾隆瓷胎珐琅彩诸问题》¹文提出,珐琅彩与洋彩用料相同,技法、装饰则不相同,洋彩属于珐琅彩类。Garner H. 在 The origins of famille rose² 文中对珐琅彩、粉彩和洋彩的来源及区别亦有所论述。王健华《清宫珐琅彩瓷综述》³文对清宫珐琅彩瓷进行介绍,还着意区分了“珐琅彩”和“清宫珐琅彩”两个概念。此外汪庆正⁴、陆明华⁵、施静菲⁶、王竹平⁷、李梅龄⁸、Henderson⁹、Kerr Rose¹⁰、Thompson¹¹等学者均有专文论述,此不一一列举。

另外,关于“唐窑”,学界亦多有解读。所谓“唐窑”,源自文献记载。《景德镇陶录》载“唐窑,厂器也,内务府员外郎唐英督造者”。《清史稿·唐英传》载“英所造者,世称‘唐窑’”。关于“唐窑”的起始年代,研究者们有不同意见。汪庆正在《唐英和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成就》¹²文中对“唐窑”的起止时间界定为唐英于乾隆二年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窑务以后,至乾隆二十一年(期间乾隆十六年曾一度中断)。张建群在《关于清代“唐窑”研究上的几个问题》¹³文中认为“唐窑”的上限应定在雍正六年。张德山《唐英与“唐窑”》¹⁴文把“唐窑”分为“早期唐窑”(雍正六年至乾隆元年)、“中期唐窑”(乾隆二年至乾隆六年)和“晚期唐窑”(乾隆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除了以上讨论,还有学者对“唐窑”产品有所关注,如叶佩兰《从故宫藏品看乾隆时期“唐窑”的新成就》¹⁵文即对唐英督造的数件御窑产品进行了讨论¹⁶。余佩瑾《唐英监造转心瓶及其相关问题》¹⁷文论及了唐英所督造之转心瓶。

亦有学者对清某朝某类御窑瓷器进行具体介绍,如 Scott Rosemary 的 Imperial Monochrome Porcelain of the Shunzhi Reign (1644-1662)¹⁸一文讨论了顺治朝单色釉御用瓷器的情况。权奎山《景德镇清代康熙时期瓷器

- 1 廖宝秀:《从档案内品名看乾隆瓷胎珐琅彩诸问题》,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古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相类研究,廖氏还著有《从色地画珐琅与洋彩瓷器谈文物定名问题》,《故宫文物月刊》,第321期;《锦上添花话洋彩——兼谈珐琅彩、粉彩》,《故宫文物月刊》第280期;《雍正皇帝的珐琅彩瓷茶器》,《故宫文物月刊》第358期。
- 2 Garner, Harry. "The origins of famille rose",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37 (1967): 1-16.
- 3 王健华:《清宫珐琅彩瓷综述》(一)、(二),《景德镇陶瓷》第四卷第四期、第五卷第一期。
- 4 汪庆正:《“粉彩”即“洋彩”考》,《上海博物馆集刊》,1981年。
- 5 陆明华:《清代景德镇粉彩瓷器初论——兼述宫廷洋彩名称之应用》,中国古陶瓷学会编:《釉上彩瓷器研究》第239页,故宫出版社,2014年。
- 6 施静菲:《十八世纪东西交流的见证——清宫画珐琅工艺在康熙朝的建立》,《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3期。同氏另还著有《雍正朝珐琅器中所见的仿古品位》,《故宫文物月刊》第319期;《从文化脉络探讨清代釉上彩名词——珐琅彩、粉彩与洋彩》,《故宫学术季刊》第29卷第4期。
- 7 王竹平:《从科学分析文献回顾看珐琅彩、洋彩与粉彩的分类与命名》,《故宫学术季刊》第29卷第3期。
- 8 李梅龄:《绽放异彩的清初珐琅彩器》,《故宫文物月刊》1985年第22期。以及《雍正时代的珐琅彩瓷》,《故宫文物月刊》1985年第23期;《清中期以后的珐琅彩》第25期;《珐琅彩瓷与彩绘瓷》第26期。
- 9 Henderson, Julian, Tregear, Mary, Wood Nigel, "The Technology of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loisonné Enamels" *Archaeometry*(1989), 31(2), 144-145.
- 10 Kerr Rose, "What wer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Famille Rose?" *Orientalism*(2000), 31(5), 53-59.
- 11 Thompson, Julian, "The Palette of Famille-rose", *Bulleti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1994), 11, 28-40.
- 12 汪庆正:《唐英和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成就》,《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2期。
- 13 张建群:《关于清代“唐窑”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景德镇陶瓷》第五卷第四期。
- 14 张德山:《唐英与“唐窑”》,《中国陶瓷》第43卷第6期,2007年。
- 15 叶佩兰:《从故宫藏品看乾隆时期“唐窑”的新成就》,《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
- 16 需得提及的是,唐英所烧造产品中也有其署名者,但并非御窑,如耿宝昌《谈唐英款的瓷器及其它》文中有所介绍,其中一件青花缠枝莲花觚,腹部开光内书青花楷书“养心殿总监造,钦命督理江西陶政,兼管江南淮、宿、海三关,暨江西九江湖口大孤塘等关税课,内务府庆丰司员外郎兼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五供全份,虔敬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二道街西口地藏王菩萨殿前永远供奉。大清乾隆五年十月朔日”,有铭文可知,此件产品为唐英自制供奉所用。
- 17 余佩瑾:《唐英监造转心瓶及其相关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31卷第4期。
- 18 Scott, Rosemary. "Imperial Monochrome Porcelain of the Shunzhi Reign (1644-1662)."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73 (2010): 145.

概述》¹文对康熙朝瓷器的基本情况有所涉及。刘良佑《明清两代的釉上彩瓷》²一文对清代的釉上彩瓷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同氏著《雍正朝官窑瓷器之鉴定》³等系列文章,以时间为轴,集中谈了清朝几个重要朝代瓷器的鉴定问题。吕成龙《雍正御窑瓷器概述》⁴文对雍正朝御用瓷器进行了介绍。余佩瑾《从唐英〈陶成纪事碑〉看雍正官窑的仿古与创新》⁵从《陶成纪事碑》出发,对雍正御窑瓷器中的仿古与创新情况进行了论述。

(二) 对御窑生产制度的研究

清代瓷器以御窑产品成就最高,这与彼时的御窑生产制度息息相关。关于清代御窑生产制度的研究,以前多散见于典籍记载,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相关研究越来越深入。

关于御窑的设立时间,《浮梁县志》《江西通志》以及《景德镇陶录》等文献多有涉及,主要基于对文献记载的不同理解,学界对此讨论热烈,主要观点包括:御窑厂始建于顺治年间;康熙十九年恢复了明代御窑及其制度;清代御窑是明代御窑的继续和发展。其中以陆明华、王光尧二人论述较详。陆明华在《清初景德镇御窑厂成因考——兼述顺治至康熙前期官瓷的烧造》⁶文中以文献记载为主,以传世材料为佐,论证认为清初御器厂是明代御器厂的继续,是从顺治三年接管旧厂后发展而来。康熙十九年不是清代御器厂的首次恢复或重建,而仅是康熙十三年战乱停烧数年后在扩大规模基础上的继续烧造。而王光尧则在《清代御窑厂的建立与终结——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一》⁷文中从文献着手,指出清代御窑厂的烧造上限为顺治五年八月(江宁清兵克复饶州),下限不晚于顺治八年(江西奉旨烧造龙碗,雍和宫佛前香炉亦有楷书铭记:“顺治八年江西监察奉敕敬造”)。至于御窑厂的停烧时间,王氏于文中指出,光绪三十三年,景德镇官窑归商办的江西瓷业公司经营,直至宣统三年,旧的御窑厂虽不再存在,但御窑瓷器的烧造仍在延续。与此相关,项坤鹏在《由柯逢时〈开办江西瓷业公司折〉引发的思考——试析江西瓷业公司的几个问题》⁸文中则提出至迟于1912年,江西瓷业公司已结束了其提供御用瓷器的职能。詹伟鸿在《江西瓷业公司与清代御窑厂关系再探析》⁹文中则提出宣统元年七月以后依然不排除江西瓷业公司有为清廷烧造瓷器的可能。

御窑瓷器并非随意生产的,而是在一系列固有模式下进行的,比如督陶官制度、官样制度、落选品处理制度等。傅振伦《唐英瓷务年谱长编》¹⁰文系统梳理了督陶官唐英的瓷务活动。前文《唐英和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成就》对唐英在制瓷方面的贡献及雍正时期的窑业成就进行了简述。宋伯胤《“陶人”唐英的“知陶”与“业

1 权奎山:《景德镇清代康熙时期瓷器概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说陶论瓷——权奎山陶瓷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2 刘良佑:《明清两代的釉上彩瓷》,《故宫文物月刊》第39期。

3 刘良佑:《雍正朝官窑之鉴定》,《故宫文物月刊》第59期。此外还有《乾隆朝官窑之鉴定》,《故宫文物月刊》第60期;《明清官窑鉴定补遗》,《故宫文物月刊》第78期;《清初官窑器鉴定补遗》,《故宫文物月刊》第69期。

4 吕成龙:《雍正御窑瓷器概述》,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古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5 余佩瑾:《从唐英〈陶成纪事碑〉看雍正官窑的仿古与创新》,《故宫文物月刊》第319期。

6 陆明华:《清初景德镇御窑厂成因考——兼述顺治至康熙前期官瓷的烧造》,《上海博物馆集刊》,1992年。

7 王光尧:《清代御窑厂的建立与终结——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2期。

8 项坤鹏:《由柯逢时〈开办江西瓷业公司折〉引发的思考——试析江西瓷业公司的几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

9 詹伟鸿:《江西瓷业公司与清代御窑厂关系再探析》,《明清官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汇编》,2016年。

10 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景德镇陶瓷馆甄励:《唐英瓷务年谱长编》,《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2期。

陶”——试论唐英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与贡献》¹文梳理了唐英在督造御用瓷器以及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蔡和璧《监督官、协造与乾隆御窑兴衰的关系》²文从乾隆一朝出发,对督陶官、协造在御窑生产中的作用有所论述。刘静敏《清代官方陶政制度初探》³文亦探讨了清御窑协造制度。孙悦《老格事迹考略》文对“驻厂协造官”老格的陶务生涯及其制瓷,成就进行了介绍,同样对“驻厂协造”的职能进行了探讨。刘森《清代官窑瓷业的技术成就与陶官制度》⁴文则对清代督陶官制度有所涉猎。古代瓷业生产中采用官样由来已久,鉴于官样能够较好地传达帝王的好尚及具体要求,清代在御窑烧造过程中将这一做法发扬光大。林业强《参古运新——刘源设计瓷样考》文重点介绍了清初刘源的生平、艺术活动及其所设计之瓷样⁵。王光尧《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⁶文中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制瓷官样入手,结合传世瓷器,对清代制瓷官样制度进行了讨论。御窑瓷器落选品的处理方式也有矩可依。权奎山《江西景德镇明清御器(窑)厂落选御用瓷器处理的考察》⁷文从御器(窑)厂遗址考古发掘资料出发,结合文献,将景德镇明清御器(窑)厂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分为三个阶段:明洪武至嘉靖时期为打碎掩埋阶段,明隆庆至清雍正六年为存贮于库房阶段;雍正七年及其以后为变价销售阶段。梁森泰《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次色瓷器变价》⁸文则对清次色瓷器变价进行了详细阐发。此外,清代朝廷对御窑厂的管理方式也呈阶段性的变化,前文《清代官方陶政制度初探》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清初由地方管理,康熙十九年后归工部管辖,雍正四年由内务府直接管理以及乾隆五十一年后再归地方管理。

(三) 对清官用瓷制度的研究

关于瓷器在清宫中的使用情况也不乏学者涉及,当时而言,瓷器遍及清宫生活、礼制活动的各个层面,而与明代乃至更早不同的是——也正如前文所述,清代相关史料文献,尤其是清宫档案保存得比较完备,我们得以藉此来推演彼时瓷器在宫廷中的使用情况。铁源于《清代官窑瓷器史》一书亦就相关问题著述颇为详细,就清宫瓷器的使用范围、收贮情况等进行了讨论⁹,只是多从清宫档案出发,对实物资料,尤其是考古出土资料开发利用不多,一些结论或值得商榷,但该书的确勾勒出了清代宫廷用瓷的粗轮廓。除此之外,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¹⁰文就清代宫廷使用瓷质礼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该文指出,在乾隆十二年以前的清代早期,瓷质祭器一如明旧,除爵为仿古彝器造型外,簠、簋、筩、豆、登、匚仅存古名,实以日用器碗、盘充代。至《皇朝礼器图式》编纂成书后,瓷簠、簋、豆、登、匚诸器也如爵、尊般烧造成古彝器造

1 宋伯胤:《“陶人”唐英的“知陶”与“业陶”——试论唐英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四卷第四期。

2 蔡和璧:《监督官、协造与乾隆御窑兴衰的关系》,《故宫学术季刊》第21卷第2期。

3 刘静敏:《清代官方陶政制度初探》,黄永川主编:《史物丛刊1·茹涵今集(下)·历史博物馆论文选刊》,1981年。

4 刘森:《清代官窑瓷业的技术成就与陶官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5 林业强:《参古运新——刘源设计瓷样考》,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古陶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6 王光尧:《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二》,《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

7 权奎山:《江西景德镇明清御器(窑)厂落选御用瓷器处理的考察》,前揭《说陶论瓷——权奎山陶瓷考古论文集》。

8 梁森泰:《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次色瓷器变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9 铁源等:《清代官窑瓷器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除了前述,该书关于御窑厂的建置、沿革以及烧造制度等也多有论述,只是多从清宫档案出发,对实物资料,尤其是考古出土资料开发利用不多,相关结论或值得商榷。

10 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

型,另外清代礼制规定国家诸祀和内廷诸祀的行礼场所和受祭对象不同,导致瓷质祭礼器的生产制度、造型与种类也有所差别。另外 Iain M Clark 在 *Yellow Glazed Ceramic Vessels for Qing Imperial State Ritual* 文中对黄釉瓷器在清宫礼制活动中的使用情况也有所探讨¹。再有,齐本红《乾隆与慈禧万寿庆典用瓷比较研究》²文,结合实物与文献资料,对乾隆与慈禧万寿用瓷的异同进行了归纳总结,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万寿用瓷主要特点。

(四) 对外贸易及文化、技术交流研究

延续了前朝对外贸易的格局,清代瓷器外销规模愈大,品类愈繁,方式愈多。关于这一问题,历来有诸多学者着墨。或许是由于获取材料相对较易,抑或是着眼较早,西方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较为积极的参与,东方学者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来也频有著述出现。关于清代瓷器的对外贸易, Van der Pijl-Ketel C. 在 *Chinese Ceramics for the Dutch Market: Porcelain from 17th century shipwreck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³ 文中以发现的沉船资料为主,讨论了十七世纪中国瓷器对荷兰的输出情况。Klose, J. 在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⁴ 文中介绍了南非三处沉船遗址中出水的包括清代瓷器在内的东方陶瓷的情况。Mengoni, Luisa 及 Rose Kerr. 在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⁵ 文中梳理了英国维多利亚 & 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中国外销瓷,其中包括部分清代瓷器。万钧在《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的外销》⁶ 文中对清代瓷器的对外输出情况及其与东印度公司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瓷器的对外输出必然带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文化与技术层面的交流:中国瓷器对促使输入地的制瓷业以及社会生活、审美取向方面的渐变,而国外市场对瓷器的特殊需求也同时反馈并改变着中国的瓷业生产状况。

Beddoe Stella 在 *Chinese Whispers: How the arrival of Chinese Porcelain inspired English Ceramic Fantasies of China c1700-1800*⁷ 文中对十八、九世纪中国瓷器对英国瓷器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刘文胜《论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瓷器贸易对瓷业的影响》⁸ 则述及了与东南亚的瓷器贸易对中国瓷业布局以及瓷艺风格的影响。谢明良:《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对欧洲贸易中的瓷器》文讲述了彼时中国对欧洲瓷器贸易的诸多细节以及对欧洲制瓷业的影响与推动⁹。

1 Iain M Clark, "Yellow Glazed Ceramic Vessels for Qing Imperial State Ritual", 《黄承天德——明清御窑黄釉器真品展览暨明清御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汇编》,景德镇,2017年。

2 齐本红:《乾隆与慈禧万寿庆典用瓷比较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2013年硕士论文。

3 Van der Pijl-Ketel, Christine. "Chinese Ceramics for the Dutch Market: Porcelain from 17th century shipwreck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72 (2009): 43.

4 Klose, J. "Oriental ceramics retrieved from thre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ships wrecked off the coast of southern Africa: the Oosterland (1697), Bennebroek (1713) and Brederode (1785)."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64 (1999): 1999-2000.

5 Mengoni, Luisa, and Rose Kerr.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75 (2012): 17.

6 万钧:《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的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

7 Beddoe, Stella. "Chinese Whispers: How the arrival of Chinese Porcelain inspired English Ceramic Fantasies of China c1700—1800",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72 (2009): 51.

8 刘文胜:《论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瓷器贸易对瓷业的影响》,《中国陶瓷工业》2012年第2期。

9 谢明良:《17至18世纪中国对欧洲贸易中的瓷器》,同氏著《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第275~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五）（明末）清初瓷器研究

清代初期是清代瓷器的滥觞时期，清代瓷器风格尚未确定，仍或明或暗地留存有明代晚期瓷器的遗痕。早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阶段的瓷器发展状况，他们将研究的视阈框定在“明末清初”这一时间架构内，并称之为“转变期”，基于此产生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比如，1911年Perzynski在Towards a Grouping of Chinese Porcelain¹书中提及明清之际一些带干支纪年瓷器的特殊性，这是迄今所知较早的研究。而关于“转变期”的起止时间，西方学者间形成了不同看法，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Soame Jenyns在The Ware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Ch'ing: 1620-1683²一文中将“转变期”的时间外延界定在1620～1683年之间；Harry Garner在Oriental Blue and White书中则将“转变期”的起止时间定为1620-1662年。此后Stephen Little在Chinese Ceramic of Transition Period: 1620-1683一文，以及Margaret Medley在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Porcelain文中均有论述。除了西方学者，日本学者也参与进来，西田宏子和出川哲朗在出版的《中国の陶磁 10：明末清初の民窑》书中，将明末清初瓷器分为三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迅速跟进，彭涛的《对明末清初景德镇陶瓷发展史的再认识》、许军的《明末清初论考》、谢小铨的《过渡期青花瓷之概念与分歧研究》及董伟等《论瓷器转变期时间的界定不应包括清初》等分别从器物发展和瓷器生产技术的角度重新界定了“转变期”瓷器的概念和时间范畴。

除了聚焦于“转变期”的起止时间和分期分段的讨论外，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有所涉猎。比如Butler, Sir M.在Chinese Porcelai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³文中对清初瓷器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徐文琴《明末清初景德镇瓷器中的市民趣味的兴起》⁴文对这一时期瓷器上所体现的市民趣味进行了介绍；纪东歌《清初期景德镇纪年瓷器分期研究》文在对清初瓷器进行了概要介绍外，还对其分期情况进行了重点探讨。

（六）科技分析研究

对于包括清代瓷器在内的中国瓷器的研究，历来是人文科学介入较多。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化，传统研究在一些争议性问题上进入了瓶颈期，而自然科学技术适时的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僵局，至少为相关研究提供佐证。比如在瓷器的新旧鉴定方面，要华、承焕生《用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鉴别清代仿明成化青花瓷》⁵文中论述了用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对瓷胎、釉化学成分进行测量以区分明成化青花瓷与清代仿品的过程。又如在瓷器的胎、釉成分分析及呈色机理的研究方面，吴隽、李家治等在《中国景德镇历代官窑青花瓷的断代研究》⁶一文中论述了采用无损EXDRF-能量色散X荧光测试方法对清御窑青花瓷进行主次及微量元素的测试并与元、明青花瓷器相区分的过程。熊樱菲《清代瓷釉制作技术的EDXRF分析研究》⁷文介绍了X

1 Perzynski, F., Towards a Grouping of Chinese Porcelain, Burlington Magazine, 1911.

2 Soame Jenyns, "The Wares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Ch'ing 1620-1683",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Vol.9, 1955, pp.20-42.

3 Butler, Sir M. "Chinese Porcelai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49 (1984): 11-39.

4 徐文琴：《明末清初景德镇瓷器中的市民趣味的兴起》，《故宫学术季刊》第七卷第四期。

5 要华、承焕生：《用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鉴别清代仿明成化青花瓷》，《核技术》2000年第6期。

6 吴隽、李家治等：《中国景德镇历代官窑青花瓷的断代研究》，《中国科学B辑·工程科学·材料科学》2004年第5期。

7 熊樱菲：《清代瓷釉制作技术的EDXRF分析研究》，《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五次学术年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技术无损测定瓷釉化学组成的原理,同时采用该技术分析并讨论了明末清初青花色料的变化情况、雍正官窑瓷器不同品种透明釉之间的关系及清代官窑不同品味青釉瓷的配釉特点。同氏又有《清代红釉(彩)瓷的呈色元素分析》¹一文,采用X射线能谱分析技术对清代瓷器的红釉(彩)进行了系统测试,获得了各种红釉(彩)呈色元素定性及半定量数据,认为清代红釉彩可以依据呈色元素划分为四类,即低温铁红彩、高温铜红釉、低温金红彩和朱砂红彩,各元素含量的改变会影响红釉(彩)的呈色。

另外,正如前文所述,清代瓷器生产虽以景德镇诸窑场为主,但其他窑场也不乏产品问世,因此学界除了对景德镇一地窑业生产及其产品的讨论外,还广有涉猎,比如对广彩、福建诸窑相关问题亦有较充分的讨论。广彩瓷器出现于清康熙晚期至雍正早期,盛于乾隆、嘉庆,终清一代不绝,复流传至今。其将景德镇白瓷在广州加彩烘烧,后主要销往国外。关于广彩瓷器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装饰技法、纹样及对外输出等方面。冯素阁、宋良璧在《略述五彩、粉彩与广彩瓷器》²文重点讨论了五彩、粉彩与广彩瓷器的区别。黄静在《广彩瓷器中人物纹饰的演变》³文中探讨了从康熙中晚期广彩滥觞伊始到清末民国,乃至现在广彩瓷器人物纹饰的发展演变规律。叶小艳《广彩瓷与中西文化交流》⁴文对广彩瓷器的对外输出情况进行了讨论,并广彩瓷风格的形成与中西文化交流之间的关系。福建是我国古代瓷器生产的重镇,其瓷业发展至清代依然延绵不断。陈建标《闽南清代陶瓷生产与厦门港对外贸易》⁵文重点讨论了以德化为中心的闽南清代窑场的生产状况及其对外输出情况。另有彭维斌《漳州窑五彩瓷的生产与外销》⁶文涉及了清时漳州窑五彩瓷生产与外销的一些问题。

四 余 论

刘毅《关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几点思考》文及王光尧《关于陶瓷考古的几个问题》文对包括陶瓷考古在内的中国古陶瓷研究进行了深入思考。前者将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唐至清代;清朝晚期到民国末年;20世纪20年代至今⁷。后者则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陶瓷考古的一个分水岭⁸。

结合上述观点,再具体到清代瓷器研究,可将清代瓷器的研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清初至民国初年——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前文“古代文献记载”部分铺陈,当时的研究者秉持金石学思路,多关注文献和传世瓷器,并着眼于“物”本身,尤其清末民国初期,多为鉴定、鉴赏之论。

第二阶段为民国初年至建国之前,陈万里、叶麟趾、周仁等开始把窑址调查和自然科技手段引入古陶瓷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关于清代瓷器研究的文章不多,以1936年吴仁敬、辛安潮合著的《中国陶瓷史》⁹为代表,

1 熊樱菲、何文权:《清代红釉(彩)瓷的呈色元素分析》,《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5年第4期。

2 冯素阁、宋良璧:《略述五彩、粉彩与广彩瓷器》,《景德镇陶瓷》第三卷第一、二期。

3 黄静:《广彩瓷器中人物纹饰的演变》,中国古陶瓷学会编:《釉上彩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

4 叶小艳:《广彩瓷与中西文化交流》,景德镇陶瓷学院2012年硕士论文。

5 陈建标:《闽南清代陶瓷生产与厦门港对外贸易》,《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1998年。

6 彭维斌:《漳州窑五彩瓷的生产与外销》,中国古陶瓷学会编:《釉上彩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

7 刘毅:《关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几点思考》,《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8 王光尧:《关于陶瓷考古的几个问题》,《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9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中国自原始时代到民国时期陶瓷业发展的历史,征引了大量的文献,并在第十二章“清时代”中对清代瓷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全书内容受《陶说》影响较大。该书利用实物资料比较少,在研究方法上不及陈万里科学,尚未跳出前人窠臼。

第三阶段为建国后至今,考古学理论已进入古陶瓷研究领域并且日臻完善,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现以及博物馆藏品的逐步披露,研究成果大量出现,逐渐进入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同时注意到,清代瓷器研究发展至目前,还远未及圆满,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清代瓷器的主要生产地景德镇,基于特殊历史阶段对地层破坏严重等各种因素,还未发现规模较大的有序的窑址地层,对包括御窑瓷器的清代瓷器相关遗址的发掘,多是零星的、被动的¹,这也为从考古学角度对清代瓷器进行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提供了难度;鉴于清御窑瓷器绝大多数署底款的特性,在考古学介入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如何论证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意义以及更好地发挥地作用,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纵观前述,关于清代瓷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大热门议题,但实际上还存在着若干空白点,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科技检测等新方式的引入,相关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此外,就本文的资料收集及梳理而言,限于笔者的学术纬度与获取资料(主要是外文资料)的难度,对国外学者成果的收录欠充分,对国内学者成果的收集也难称穷尽。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之一,也是今后可持续进行的工作。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¹ 参见江建新:《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收获》,江建新主编:《明清官窑研究(一)》,华龄出版社,2017年。